

中国大百科全书

天 涯

中国大百科全书

民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86.6

本卷主要编辑、出版人员

总 编 辑 姜椿芳

副 总 编 辑 石 磊

编 辑 主 任 李世杰

责 任 编 辑 金效静 潘祖淦

特 约 编 辑 (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国栋 王恩庆 尹文成 刘 锴

刘先照 张公瑾 阿拉坦 陈 鹏

陈连开 瞿霭堂

编 辑 钟幼兰 段太奇

图 片 编 辑 郅宗远 陈 林 (助理)

地 图 编 辑 郁可可

资料核对、统一 段太奇 卞小勤 滕振微

索 引 蒋仲英 马五一

装 帧 设 计 张慈中

责 任 校 对 姚明耿 顾慧琴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民 族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总社: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甲1号 分社:上海古北路6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装 上海市印刷一厂彩图分色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6.75 插页 43 字数 1,736,000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17197·52 精装(甲)国内定价: 26.55元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乔木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光远	贝时璋	卢嘉锡	<u>华罗庚</u>	刘瑞龙	严济慈
吴阶平	沈 鸿	宋时轮	张友渔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茅以升	周 扬	周培源	姜椿芳	夏征农
钱学森	梅 益	裴丽生			

委 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光训	于光远	马大猷	<u>王 力</u>	<u>王竹溪</u>	王绶琯
王朝闻	牙含章	贝时璋	艾中信	叶笃正	卢嘉锡
包尔汉	冯 至	司徒慧敏	吕 骥	吕叔湘	朱洪元
朱德熙	任新民	<u>华罗庚</u>	刘开渠	<u>刘思慕</u>	刘瑞龙
许振英	许涤新	孙俊人	<u>孙毓棠</u>	<u>杨石先</u>	杨宪益
苏步青	李 珩	李国豪	李春芬	严济慈	肖 克
吴于廑	吴中伦	吴文俊	吴阶平	吴作人	<u>吴学周</u>
吴晓邦	邹家骅	沈 元	沈 鸿	宋 健	宋时轮
张 庚	张 震	张友渔	张含英	张钰哲	陆 达
陈世骧	陈永龄	<u>陈维稷</u>	陈虞孙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林 超	茅以升	罗竹风	季 龙	季羨林
周 扬	周有光	周培源	孟昭英	柳大纲	胡 绳
胡乔木	<u>胡愈之</u>	荣高棠	赵朴初	侯外庐	侯祥麟
段学复	俞大绂	宦 乡	姜椿芳	费孝通	贺绿汀
夏 衍	<u>夏 鼐</u>	夏征农	钱令希	钱伟长	钱学森
钱临照	<u>钱俊瑞</u>	倪海曙	殷宏章	<u>翁独健</u>	唐长孺
唐振绪	陶 钝	梅 益	黄秉维	曹 禺	董纯才
程裕淇	傅承义	曾世英	曾呈奎	谢希德	裴丽生
潘 菽	潘念之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乔木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光远	贝时璋	卢嘉锡	华罗庚	刘瑞龙	严济慈
吴阶平	沈 鸿	宋时轮	张友渔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茅以升	周 扬	周培源	姜椿芳	夏征农
钱学森	梅 益	裴丽生			

委 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光训	于光远	马大猷	王 力	王竹溪	王绶琯
王朝闻	牙含章	贝时璋	艾中信	叶笃正	卢嘉锡
包尔汉	冯 至	司徒慧敏	吕 骥	吕叔湘	朱洪元
朱德熙	任新民	华罗庚	刘开渠	刘思慕	刘瑞龙
许振英	许涤新	孙俊人	孙毓棠	杨石先	杨宪益
苏步青	李 珩	李国豪	李春芬	严济慈	肖 克
吴于廑	吴中伦	吴文俊	吴阶平	吴作人	吴学周
吴晓邦	邹家骅	沈 元	沈 鸿	宋 健	宋时轮
张 庚	张 震	张友渔	张含英	张钰哲	陆 达
陈世骧	陈永龄	陈维稷	陈虞孙	陈翰伯	陈翰笙
武 衡	林 超	茅以升	罗竹风	季 龙	季羨林
周 扬	周有光	周培源	孟昭英	柳大纲	胡 绳
胡乔木	胡愈之	荣高棠	赵朴初	侯外庐	侯祥麟
段学复	俞大绂	宦 乡	姜椿芳	费孝通	贺绿汀
夏 衍	夏 鼐	夏征农	钱令希	钱伟长	钱学森
钱临照	钱俊瑞	倪海曙	殷宏章	翁独健	唐长孺
唐振绪	陶 钝	梅 益	黄秉维	曹 禺	董纯才
程裕淇	傅承义	曾世英	曾呈奎	谢希德	裴丽生
潘 菽	潘念之				

民族编辑委员会

主任 包尔汉

副主任 江 云 牙含章 秋 浦 马 寅

委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 寅	马 曜	马学良	牙含章	平错旺阶	包尔汉	
刘荣焌	江 云	宋蜀华	李有义	李宏烈	严学窘	张 宣
张汉城	陈永龄	林耀华	赵卫邦	秋 浦	侯哲安	费孝通
翁独健	浩 帆	梁钊韬	傅懋勳			

顾 问 方国瑜 白寿彝 杨 堃 杨成志 吴文藻 吴泽霖

各分支学科编写组主编、副主编

民族问题理论

主 编 马 寅

副主编 李宏烈 韩戈鲁 汤正方

民 族 学

主 编 林耀华

副主编 宋蜀华 詹承绪 黄淑娉

中 国 民 族 史

主 编 翁独健

副主编 陈永龄 刘荣焌 杜荣坤

中国民族语言文字

主 编 傅懋勳

副主编 马学良 王 均 戴庆厦

世 界 民 族

主 编 费孝通

副主编 金天明 阮西湖 李毅夫

前 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两千年来曾经出版过四百多种大小类书。这些类书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它们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历代科学文化典籍中的重要资料。较早的类书有些已经散佚，但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也为数不少，这些书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各种类书体制不一，多少接近百科全书类型，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十八世纪中叶，正当中国编修庞大的《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欧法、德、英、意等国先后编辑出版了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以后美、俄、日等国也相继出版了这种书。现代型的百科全书扼要地概述人类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二百多年来，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知识分类、编辑方式、图片配备、检索系统等方面日益完备和科学化。今天，百科全书已经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和专科的百科全书几乎象辞典那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辑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本世纪初叶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包括近似百科型的辞书《辞海》。但是，这些书都没有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也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1958年又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编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学科的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缺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准备在出第二版时，再按现在各国编辑百科全书一般通行的做法，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而

按字母顺序排列，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检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每一学科的条目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同时附加汉字笔画索引和其他几种索引，以便查阅。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初步拟定，全书总卷数为80卷，每卷约120~150万字(包括插图、索引)。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出齐。全书第一版的卷数和字数都将超过现在外国一般综合性百科全书，但与一些外国百科全书最初版本的篇幅不相上下。我们准备在第二版加以调整和压缩。

《中国大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出版，不列卷次，每卷只标出学科名称，如《哲学》、《法学》、《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等。

全书各学科的内容按各该学科的体系、层次，以条目的形式编写，计划收条目10万个左右。各学科所收条目比较详尽地叙述和介绍各该学科的基本知识，适于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使用。这种百科性的参考工具书，可供读者作为进入各学科并向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桥梁和阶梯。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除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外，还准备编辑出版综合性的中、小型百科全书和百科辞典，与专业单位共同编辑出版各种专业性的百科全书，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是在全国各学科、各领域、各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参加下进行的，并得到国家各有关部门、全国科学文化研究机关、学术团体、大专院校，以及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是全书编辑工作能够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有力保证。在此谨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书在出第二版的时候能有所改进。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

1980年9月6日

凡 例

一、编 排

1. 本书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一学科辑成一卷或数卷,有的两门或数门学科合为一卷。本学科《民族》为一卷。

2. 本书条目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第一字同音时,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声调顺序排列;同音、同调时,按笔划的多少和笔顺排列;第一字同音、同调、同笔划时,按第二字的音调、笔画的顺序排列,余类推。

3. 各学科均列有本学科全部条目的分类目录,以便读者了解本学科的全貌。分类目录还反映条目的层次关系,例如:

中国民族语言·····	554
汉藏语系·····	164
汉语·····	158
藏缅语族·····	522
藏语支·····	527
藏语·····	525
嘉戎语·····	202
门巴语·····	279
景颇语支·····	210

4. 本卷所列分类目录,只为读者按类查索方便,并不完全反映民族各分支学科体系,也不反映中国民族界对民族分支学科体系划分的不同学术意见。

5. 各学科在分类目录之前一般都有一篇介绍本学科内容的概观性文章,本卷称总论。

6. 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条目,例如“匈奴”、“鲜卑”、“乌桓”在民族卷和中国历史卷均设有条目,其释文内容按该学科的要求有所侧重。

7. 为了区分国内外民族,本卷对国外民族(包括与中国某些民族同源的民族)统称“××人”,对国内现代民族统称“××族”。

二、条 目

8. 条目标题多数是一个词,例如“部落”、“家庭”;有的是词组,例如“古代民族”、“西藏农奴制”。

9. 本卷各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未单独立条,在本卷“内容索引”中设有有关的主题索引。

10. 条目标题上方加注汉语拼音,多数条目标题附有外文名,例如:

buluo lianmen
部落联盟 (tribal confederacy)。

总 论

包尔汉 江 云 牙含章 秋 浦 马 寅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目前还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世界。人们的民族区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广泛的影响。各个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民族差异和特点,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压迫制度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和斗争,以及各族人民在不同条件下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入现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民族因素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民族和民族问题已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

民族和民族问题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将来,当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以后,随着各民族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民族差别将逐渐消失,全人类将融合为一个没有民族区分的整体。

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再后是民族消亡。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民族最早形成于哪个时代,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与国家同时或先后形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民族早在蒙昧时代便已形成。

在中国学术界,正由于对民族形成的时代看法不同,因而不同学者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此外,“民族”一词还有一种含义比较广泛的用法:既指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见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也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印度民族、阿拉伯民族、大洋洲民族等。这种广义的民族概念,相当于英语 *ethnos*、*people* 和俄语 *этнос*、*народ* 的含义;而狭义的民族概念,则相当于英语 *nation* 和俄语 *нация* 的含义。本卷多数情况用于广义。

汉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据现已查到的资料来看,最早是在 19 世纪后半叶。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国外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民族一词便在国内开始普遍使用。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直到近几十年,始逐渐区分开来。

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亦称人种,以人们体质形态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眼色、发色、发形、血型等)为标志,属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形成为许多不

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的人，有时也包括有不同的种族成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情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疆界和民族疆界，有时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了单一成分的民族国家；但多数情况是不一致的，在一个国家的地域内居住着众多民族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同一民族的人们散布到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现象亦非罕见，因而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目前，全世界共有大小民族两千多个。据 1980 年统计，人口上亿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有 7 个，共 18 亿多人。此外，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有 60 多个，百万以上的有 200 多个，十万以上的有 500 多个。这些民族的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99% 以上；其余一千多个民族，总共约有 4 000 万人。这些民族在种族成分、语言系属、宗教信仰、分布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呈现出一派极其复杂纷繁的景象。

从种族成分上看，世界各民族通常被区分为三大人种（及各种混合类型）。在全球人口中，欧罗巴人种约占 43%，过去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北印度，16 世纪后逐渐扩散到美洲、大洋洲和南非；蒙古人种约占 41%，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约占 16%，主要分布在热带非洲、大洋洲、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16 世纪后一部分被欧洲殖民者强运至美洲。从语言系属上看，世界各民族的语言通常被区分为十多个语系。在全球人口中，属印欧语系的民族约占 45.5%，汉藏语系的约占 25%，其次为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南岛语系、闪含语系、达罗毗荼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从宗教信仰上看，现在已有一部分人是无神论者；但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宗教仍具有很大影响。在全球人口中，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人，约占 50% 左右；信奉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和神道教等地区性宗教以及各种原始宗教的人，约占 25%。

世界各民族分布于五大洲四大洋，从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大沙漠，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星罗棋布的太平洋岛屿，人们生活在自然景观和物产资源迥然不同的广大地域上，从事着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创造着多彩多姿的文化艺术，使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闪耀着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辉。然而，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水平上呈现出极大的差距。今天，当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类的触角已伸向太空、正在进一步揭开宇宙奥秘的时候，至今在亚非拉和大洋洲的孤岛荒野、偏僻山区和热带丛林里，仍有一些原始民族停留在钻木取火、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石器时代。如果将各民族现在所处的社会状况按历史发展顺序加以排列，在我们面前便会展示出一幅从原始公社制到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生动画面。在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化石”，能为我们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提供极其宝贵的实证资料。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远古起，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中国这块辽阔富饶的大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伟大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又共同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今天，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共同生活着 56 个兄弟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 10 亿多人口的 93.3%；其余 55 个民族，约占 6.7%，共约 6 723 万人，因其人口所占比例较小，习惯上一般统称少数民族。（参见彩图插页第 2~8 页）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有壮族；人口在千万以下、百万以上的，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等 14 个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下、十万以

上的,有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柯尔克孜、土、羌等 14 个民族;人口在十万以下、一万以上的,有景颇、达斡尔、仫佬、布朗、撒拉、毛难、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鄂温克、崩龙(现称德昂)、裕固、京、基诺等 18 个民族;人口在一万以下的,有保安、塔塔尔、独龙、鄂伦春、门巴、珞巴、俄罗斯、赫哲等 8 个民族。

中国各民族的种族成分相当单纯,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类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或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但在语言上则比较复杂。除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外,其余 54 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分属五个语系:语言属汉藏语系的有 29 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属阿尔泰语系的有 17 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属南亚语系的有 3 个民族;属印欧语系的有两个民族;属南岛语系的有一个民族;还有某些民族的语言,系属尚未确定。宗教在汉族地区势力不大,但在少数民族中却有着广泛的影响。某些民族甚至保持着多数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情况,如藏族、蒙古族之信仰喇嘛教,傣族之信仰小乘佛教,回族、维吾尔族之信仰伊斯兰教等。这就使宗教具有了民族性。宗教信仰本不是民族特征,但在很多情况下,宗教问题又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问题。

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各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汉族多住中原、少数民族多住边疆的状况,但在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界线。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有的地区,汉族居民甚至还占多数。各少数民族除有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外,并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此外,还有 1 700 多万的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在全国各省、市的大小城镇和乡村。这种分布情况,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虽小,但分布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50~60%,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并处于国防要冲,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汉族人口众多,在其居住的中心地区,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比较发达,长期以来,曾对各少数民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汉族也不断地从少数民族中吸取经济文化成就。正是在长期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中,早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内在联系。今天,这一联系更不断增强。

然而,由于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所留下的不良后果,各民族间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见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都给今日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提出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因而,民族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依然存在。当然,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民族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或者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民族问题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

民族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往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在对抗状态中发生和发展的,其突出表现形式,就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民族斗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但民族斗争不等于阶级斗争。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是交错发生的。总之,民族问题并不是什么孤立自在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演变和革命的发展,民族问题也相应发生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自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当人类历史进入 17 世纪以后,在西方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资产阶级日益

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为了争夺商品市场,遂以民族为旗号发动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全民运动,从而使民族问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东欧与亚洲爆发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内容。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对立。这时的民族问题已超出了国家的范围,而扩大为世界性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东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遂使民族问题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从过去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一系列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冲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开始迈进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更为近四分之一的人类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随着人类历史的这一伟大转变,民族问题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压迫制度以后,民族关系基本上已成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民族矛盾在多数情况下是人民内部矛盾。消除以往剥削阶级在民族关系上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解决历史上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加强民族团结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便成为新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的舞台上。每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和对待民族问题的,而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也服从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并在各个方面形成对立。从而在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上,也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民族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见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见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民族只有发展上的先进后进之别,而无优劣、高低、贵贱之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赋有多方面的聪明才智,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现存社会的民族不平等现象,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阶级造成的,所以,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

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他们坚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以本阶级的利益充当全民族的利益,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性质,是进步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已演变为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见沙文主义)、领土扩张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甚至借助荒谬的种族主义理论,以“优等民族”自居,统治压迫其他民族,这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种族主义的性质和内容,在当代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这是一种革命的战斗

的民族主义。此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民族主义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也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即支持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民族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观,是两种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民族观既指导着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同时也指导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因而,在民族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两种民族观的对立和斗争。

民族研究的历史发展

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一般简称“民族研究”。民族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领域,牵涉的范围广,涉及的学科多。在进行民族研究时,不论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考察,还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进行理论探索,一般都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专门学科。特别是关于民族来源、历史演变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离开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便难以进行有效的综合和深入的分析。至于有关各民族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时还要涉及到更多的学科。

作为科学的民族研究,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历史上以民族为对象所作的观察和记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积累,则是源远流长。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出于和平交往或进攻防御的需要,便开始有了对周围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尔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对民族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人们关于民族知识的积累,经历了一个由近而远、由传说到实证、由粗略到翔实、由感性到理性的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从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到19世纪中叶,大约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时间。

在中国,早在殷契卜辞和周金铭文中便有了关于近邻民族的零星记载,《尚书》、《山海经》等先秦古籍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的片断资料。至西汉司马迁作《史记》,特别重视实地考察,除大量记载历代社会经济情况外,并以《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形式系统地记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开创了为各民族作“传”的先例,这对中国史学有深远的影响。此后官方编史,代代相沿,从而使民族资料在二十四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以外,各民族学者还撰有许多包含丰富民族资料的著作,如《禹贡》、《水经注》、《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蛮书》、《桂海虞衡志》、《蒙古秘史》、《突厥语词典》、《满洲源流考》等等。历代地方志、文集、游记、族谱和碑铭,也包含有关于许多民族社会结构、政治状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的生动记载。至于象《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经行记》、《诸蕃志》、《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西洋番国志》、《海国图志》一类的著述,则更详细地记录了中亚、南亚、东南亚乃至远达东非地区众多民族的生活状况。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所保存的极其丰富的民族资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在国外,有关民族知识的积累,也可上溯到遥远的古代。古埃及金字塔的壁画中绘有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古巴比伦、亚述、波斯帝王的铭文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情况的早期记载。此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和古罗马学者C.塔西佗写的《日耳曼尼亚志》,开始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民族情况。公元1世纪初,古希腊的历史、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地理学》一书,曾提到从不列颠到印度、从北非到波罗的海这一广大地区的八百多个民族。中世纪时,在欧洲僧侣、商人和旅行家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有关欧洲、北非和西亚各民族的记述。特别是《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开始了解到中国、中亚和东南亚民族的情况。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欧洲各国的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泛舟远航,到达美洲、非洲、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他们关于所接触到的各民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报道,大大丰

富了世界民族资料的宝库。18 世纪开始出现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如法国传教士 J.-F. 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1724)和 C. 德布罗斯的《偶像崇拜》(1760)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J.-J. 卢梭、C.-L. de 孟德斯鸠、D. 狄德罗和伏尔泰,在论证人类早期社会状况时也曾广泛运用美洲和大洋洲的民族资料。

1640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在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欧洲,科学已冲破宗教和自然哲学的束缚,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分化为许多独立的学科,形成近代科学体系。然而,这时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各学科,主要都是以研究欧洲民族为对象的;而对于“地理大发现”后所接触到的非欧洲民族则是陌生的。于是,至 19 世纪中叶,形成了一门专以研究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落后民族为对象的独立学科——民族学(Ethnology)。至于当时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则不在民族学研究的范围,而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范畴。为了适应各国资产阶级争夺民族市场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这些学科曾进行大量研究,并留下一系列论述民族性、民族原则和民族主义的著作。后来,随着西欧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向殖民帝国的转变,关于欧洲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降到次要地位;西方学者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争夺的广阔世界,遂使民族学得以迅速发展。

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尚处在上升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学者多具有进取精神,并试图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在英国生物学家 C. R. 达尔文进化思想影响下,首先在民族学中形成了“进化学派”。到 19 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转向反动,甚至连进化论也难以容忍。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影响相对抗,在民族学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反进化论学派,如德、奥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派”、法国的“社会学派”和英国的“功能学派”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些学派,则不同程度地具有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民主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崩溃,西方国家的民族学者已不能再局限于对殖民地落后民族的研究,而开始转向发展中民族和发达民族,从而造成民族学与民俗学、社会学的合流。战后国外民族学的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第三世界许多新兴国家也开始进行本国的民族研究。过去西方民族学者对他们国家所做的调查、所写的著作,尽管在理论和观点上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或偏见,在政治上曾被殖民主义国家所利用;但是,在资料的积累上,对这些新兴国家的民族研究和有关学科的发展则是有益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各国民族情况的了解。

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首先传入中国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当时,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深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所有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大力提倡民族主义,试图用民族精神促使全国人民觉醒并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民族,以抵抗列强的欺凌,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一思潮支配着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曾涌现出大批阐释民族主义、论述民族概念、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疾呼民族危亡、维护民族尊严、宣扬民族精神、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平等的文章和著作。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了国内各民族历史、社会、语言、文艺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各种近代科学。早在 19 世纪末,章太炎便在《序种姓》一文中开始研究中国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1901 年,梁启超便在《清议报》上撰文阐发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

精神；至20年代，并进一步在大学讲坛上发表其关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源流、系属和分布的史学见解。在这一时期，其他学者也先后编撰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专著。这些前辈们的博识宏论，打开了当时人们的思路，为中国近代民族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进一步扩大了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影响。1928年，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1934年后改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兼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曾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进行了综合调查或专题调查，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除中央研究院以外，当时燕京、清华、云南、四川等大学也分别进行了一些民族研究工作。1934年成立中国民族学会，第一次将全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同年，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则推动了民族史地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集中到西南和西北各地。于是，对于西南和西北各民族的调查研究逐渐增多，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书刊，遂使国内民族研究粗具规模。

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象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多受剥削阶级偏见的束缚，未能形成真正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则贯穿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而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向前发展。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吸收并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和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民族研究。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刚刚兴起，当即引起他们的关注。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A·巴斯蒂安《历史上的人类》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阅读了德布罗斯、梅纳斯、汉密尔顿、米莱尔、皮凯林等人的作品，研究了J·J·巴霍芬、J·F·麦克伦南、H·J·S·梅因、J·拉伯克、E·B·泰勒和M·M·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做了许多笔记和摘要。他们对L·H·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一书评价尤高，认为他在主要点上发现和恢复了人类成文历史的史前基础。马克思曾对此书做了详细摘要，并打算联系自己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未能如愿。恩格斯执行了马克思的遗言，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以及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分析和论述，为研究古代民族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专门研究了欧亚许多近代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他们在阐述爱尔兰、波兰、匈牙利、中国、印度、波斯和中亚问题的一系列论著中，以及《共产党宣言》（1848）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他们将民族和民族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解放是劳动人民社会解放的一部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因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B·И·列宁也对欧亚各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等重要著作，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和社会内容，建立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

问题的一部分,关于应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关于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历史趋向,关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以及关于民族发展、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等等的论述,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纲领和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И. В.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2~1913)、《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族概念、民族问题发展三个时期、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发展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原理,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民族学也得到改造,而逐步发展为研究国内外古今一切民族的学科,改变了西方民族学只研究不发达民族的格局。苏联民族学于 50 年代传入中国,曾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的日益丰富,推动着民族研究不断地向前发展。除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研究的指导思想以外,在西方也有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进步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与西方民族学中的一些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马克思主义对于第三世界一些新兴国家民族研究的影响更为广泛。

新 中 国 的 民 族 研 究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以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为基础创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设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关于反抗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推翻国内反动统治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论述,关于揭示中国民族关系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论述,关于加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论述,关于社会改革和民族繁荣、培养民族干部和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论述,以及克服民族主义和搞好民族关系等等的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纲领,同时也是对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乃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中国的科学的民族研究,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十分重视了解、研究国内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注意了解和搜集沿途各民族的社会情况。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建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内所接触到的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与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一些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及现实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研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50 年,政务院在关于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均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不久,又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先后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识别是民族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